

“唐丁霍的儿子”，完成父亲梦想

我出生的时候，父亲正在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名叫特雷斯科拉松伊斯——意为“三颗心脏”的小镇参加半职业联赛。说实话，他们的境况很不好，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精英俱乐部的薪水还算不错，其他大部分俱乐部都穷得叮当响。所以，足球运动员总背着一种耻辱，就像舞蹈家、艺术家等职业——其从业者追逐的是热情，而非金钱回报。我们家在不同的城镇间漂泊，父亲在哪里踢球，我们就搬到哪里。曾经有一年的时间，我们全家住在一个旅馆里——那种与豪华毫不沾边的旅馆，后来我们常常将其当成笑料，说那是个供球员和差旅商人、流浪汉落脚的零星级酒店。

1942年，就在我2岁生日之前，似乎所有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。父亲迎来了事业的转机，他被米内罗竞技俱乐部——米纳斯吉拉斯州最大、最有钱的俱乐部招入麾下。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份既能踢球又能养活我们全家的的工作，甚至能使家庭迈入小康的行列。那时父亲25岁，他的辉煌前程才刚刚开始。但是，就在他的首场比赛中——对阵的是里约的圣克里斯托旺俱乐部，当父亲全速与对方一位名叫奥古斯托的后卫撞在一起时，灾难发生了。

奥古斯托没什么大碍，他康复之后继续踢球。但父亲却灾难性地伤了膝盖——韧带，或许是半月板。我说“或许”，是因为当时没有核磁共振对其进行细致检查；事实上，当时的巴西，连运动医学都没有。我们不知道他伤在哪里，也不知道该如何治疗。我们只知道在伤处敷上冰袋，抬高它，听天由命。不消说，父亲的膝伤再也没有痊愈。因为无法再度出场比赛，父亲很快就被俱乐部解雇，回到了特雷斯科拉松伊斯的家里。父亲从此就靠打短工挣钱，家里的生计常常难以为继。

即便是在境况最好的时候，家里的生活也很艰难，现在父亲回到了家里，养着膝盖，希望它能痊愈，从而能够再次返回米内罗竞技或者其他赚钱的俱乐部里踢球。我理解他这样做的原因，他认为这是能给家人像样的生活的最佳途径。但是，因为他不再踢球，家里就几乎没有了收入，而在上世纪40年代的巴西，又没

有任何社会保障体系。更严峻的是，家里又多了两张吃饭的嘴——我的弟弟雅伊尔、妹妹玛利亚·露西亚又出生了。另外，祖母安博罗西娜、舅舅豪尔赫也搬来与我们同住。

我们兄妹几个都穿着二手衣服，有时候甚至是穿用装麦子的麻袋改成的衣服，也没有钱买鞋。有时候，家里仅有的食物就是面包加上一片香蕉，有时则是舅舅从工作的杂货店里带回家的大米和豆子。而与很多巴西人相比，我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，因为我们从未挨饿。并且，家里的房子还算宽敞，全家人并未住在贫民窟(用巴西话说，是favela)里。但是房子的屋顶漏水，一下雨就满地是水。全家人始终是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，因为大家——包括两个小孩子在内——都不知道下一顿饭从何而来。任何经历过这种贫困的人都有这种体会，这是一种忐忑、一种恐惧，一旦进到你的骨头里，就永远摆脱不掉。说实话，时至今日，我有时候还有这种感觉。

搬到巴鲁之后，家里的境况稍稍有了好转。父亲在卡萨卢西塔尼亚商店找到一份工作，其老板正是巴鲁竞技俱乐部——BAC——的老板，而BAC是巴鲁两支半职业球队之一。周一到周五，父亲就在商店里干着跑腿打杂的活，煮咖啡、送咖啡、寄信等等。到了周末，他就是BAC的明星中锋。在球场上，父亲展现出了曾经一度让他接近成功的足球才华。他攻入了很多进球，1946年他带领BAC得到了圣保罗州的半职业联赛冠军。他还有种非凡的魅力，即便经历了足球生涯的厄运，他仍保持优雅和勇气。巴鲁的每个人都认识他，喜欢他，而我也总被人认出是“唐丁霍的儿子”。但家里的日子还是很难，我甚至想——如果不能为家里的饭桌上带来食物，名气管个什么用。

为什么父亲不去学另一门技能，从事另一种职业？足球就是这么慷慨，又这么残酷。

约人无言地聚集在百老汇和第七大道的马路和排水沟旁，观看电子屏幕的消息，购买晚报，或围在有收音机的出租车旁。人群从39街延伸到47街，在那里，弗朗西斯·达夫神父的塑像仿佛在保佑着人们。弗朗西斯·达夫神父是纽约参加了一战的“善战的步兵第69团”的随军牧师，也是比尔·多诺万的同志和崇拜者。时代广场的行人、汽车和电车司机突然停下，仰望电子屏幕上的可怕消息，引起车辆不时发出刺耳的急刹声。

不过，当晚大多数纽约人并未在时代广场通宵达旦地关注局势发展。他们开始了为期3天的劳工节(劳动节)假期，想到的是休息而不是战争。许多人计划去海边或山里度假。他们留下的空间很快被成千上万涌入纽约，参观法拉盛草原公园举行的世界博览会的人们填补。“整个国家对世界危机并未有任何感知。”罗斯福私下说，大多数美国人憎恨阿道夫·希特勒，希望盟国获胜，但帮助盟国赢得战争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仅有六分之一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在某个时刻参战，赞成美国立即宣战的人的比例仅为1/40。20%的人赞成以其他方式帮助盟国，但超过半数的人认为美国应该保持中立。战争显得异常遥远，并非那么咄咄逼人。

温德尔·威尔基是企业律师，并且是庞大的联邦和南方公用事业股份公司总裁，总部在商业区的松树街20号。他出生在印第安纳州一个小镇，现在和妻子伊迪丝住在第五大道1010号。那一幢豪华公寓建筑，与都会艺术博物馆隔街相望，但他们依然保留了小镇的生活习惯，例如外出时不关公寓大门。威尔基高大魁梧，虎背熊腰，就是不修边幅。他的个性极具魅力：一位记者写道，与他交往的人“通常会感觉他身高14英尺(约4米)，双眼炯炯发光”。尽管终生为共和党人，他还是决定在1940年参加与富兰克林·罗斯福的选举竞争。他的总统参选人身份在两周前得到确定，当时，他去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的索格塔克哈伯访问了《财富》杂志编辑拉塞尔·达文波特。他脱掉了外衣，衬衣上散落着雪茄烟灰，“严肃费劲地”和达文波特谈着他的政治理念和前景，后者很快签约同意作为他的竞选经理。

中了足球的魔咒，就永远没有脱身的时候。当父亲发现自己的梦想已近破灭，他就将自己的身心和梦想都放在了另一个人身上。

“踢这里。”他说着，指着家里墙上的一个点。如果我踢出的球击中了目标，他就会咧嘴一笑，接着又沉下脸来。“很好！换另一只脚！”砰！“用头顶！”砰！就这样，一连好几个小时的练习，有时直到夜晚，就我们两个人，我和他。这些都是足球的基本功：盘带，射门，传球。绝大多数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机会到镇上的球场里练习，就找块空地练起来：家里的小院子、外面的街道(即鲁宾斯·阿鲁达大街)都是我们练球的场地。有时候他给我讲自己比赛的经历，有时候则是给我演示学来的或自创的动作。偶尔他还会给我说起他的哥哥，父亲说，他哥哥是一个中场球员，得分能力比他还强，但在25岁就去世了——纳西门托家里又一个前途无量却中道夭折的惨剧。

大多数时候，我们就是在练球，学习足球的基本技能。回头想想，有些练习十分有趣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将足球挂在树枝上，我连几小时用头顶它。但跟父亲教我用头将球顶入球网的技术相比，那就是小儿科了。他会双手抱球，用它一遍遍砸我的前额，嘴里还说：“别眨眼！别眨眼！”他的观点是，要想把头球练好，首先就是在顶球时睁着眼睛。他甚至对我说，只要是在家里闲着没事，就要拿球自己砸自己的头。我听他的话，就这么做了，现在想想，当时的样子一定很滑稽。但是，很显然，父亲认为这种练习是非常重要的。他是对的，这种训练使我在职业生涯中获益匪浅。

除了头球，父亲还重点让我学会两种技能：一是在控球时将球控制得离身体越近越好；二是不管什么动作，双脚要做到同样好。为什么他要重点强调这两个技能？也许是因为我们受到练习场地的限制——巴鲁的街道、后院、小巷等等。也许父亲意识到我瘦

小的身材。成年后，我的身高只有1.70米，即便在那个时候，我的身高也算比较矮小的。所以，跟父亲不同，我在球场上没有身体优势。如果我不能将对手撞开，不能比他们跳得更高，那我脚上的技巧就得比他们更好，我得学会将球变成身体的延伸。

说实话，父亲教我这些其实是冒着很大风险的，因为母亲很不愿意她的长子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。在母亲看来，足球就是一个死胡同，是一条通往贫困的道路。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，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全家人。她想让我把空闲时间都用在学习上，用知识去改变命运。从过去到现在，她一直就像是坐在我肩头的天使一样，总在鼓励我们去作正确的、高尚的、有益的事。她想让我们过得更好。所以，开始那几年，每当她逮到我踢球，就会痛骂我一顿。

母亲良苦的用心阻挡不了父亲和我。她又能做什么呢？我们父子二人都中了足球的魔咒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们仍是在小院子里练球。母亲走到旁边，双手叉腰，听天由命般长叹道：“嗯，真好，又把你的大儿子拉进去了。等他吃不上饭的时候，可别跟我抱怨说后悔没让他学医、学法律！”父亲则抱着她的腰，笑着答道：“别担心，塞莱斯特。等他把左脚练好，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。”

体育梦破灭的父母转而去训练自己的儿女重走自己的道路，也常常伴随着风险。有的孩子厌恶这种期望所带来的压力，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。原因很简单：我爱足球。我喜欢脚上有球、脸上洒满阳光的感觉，还有队友间的友情、进球后全身过电一般的兴奋……但更重要的是，我喜欢跟父亲在一起。在我们练球的那些时间里，父亲绝不可能认为我有一天会因为踢球而变得出名、有钱，在那个年代，这种想法是绝无可能的。我想，他只是爱这项运动，并想把这种爱传给自己的儿子。他做到了。我想说，我对足球的爱从未衰减过。

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

[美] 迈克尔·富利洛夫

2.打开写有他名字的信封

9月2日午夜时分，享用了丰盛的晚餐后，这些先生们开始玩桥牌。这时，帐篷的布帘抖动起来，一位陌生人闯了进来，“我是印第安人使者”，他说，“你们有封信。”这位信使在荒野跋涉了30个小时才把信息带给了伍德将军。虽然他倾向孤立主义立场，但他已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政府顾问机构，5人组成的战争资源委员会的成员。伍德打开写有他名字的信封，匆匆扫描了一下电文内容，然后说了一声：“开战了！”

远离美国首都的还有哈里·霍普金斯，罗斯福的商务部长和心腹。当总统的表妹戴西·萨克利第一次遇到这位前社会工作者转型的政客时，认为他是“我所见到的最无吸引力的人……面容奇特猥琐、瘦弱、懒散，衣冠不整”。但她和大多数人一样，也逐渐喜欢上了他。霍普金斯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，令人发笑的幽默感和“十足的魅力”。他还有非凡的能力，能洞察并解读极其困难和深奥的问题的核心，这种能力今后会让温斯顿·丘吉尔给他颁布一个搞笑的头衔：“能洞察问题核心的勋爵。”

在9月的第一周，霍普金斯面临众多难题：一种神秘的营养性疾病，他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梅奥诊所就诊的医生担心，这种疾病会对他生命构成威胁。霍普金斯骨瘦如柴，常卧床不起。他视力衰退，双脚浮肿。他的家人曾被告知他的生命仅能维持几周了。但是，他快乐地接受了一系列难受的试验性治疗，希望能够痊愈，并和罗斯福保持电话联系，通过收音机对欧洲事态的进展保持关注。在每大夜以继日地“倾听世界新闻”后，他对朋友说：“我现在将自己看做是当之无愧的权威。”霍普金斯清楚，除非他战胜疾病，否则难以回到“可用人员名单”。但他承认自己坐立不安：“外边发生的一切如此令人兴奋，困在轮椅上指手画脚令人难受。”

其他两人居住在纽约，德国入侵波兰的新闻在美国时代广场的《纽约时报》大厦的大型电子屏幕上循环播出。当夜幕降临曼哈顿，纽



3.一个外国老头向他招手

平心而论，洋人样子固然怪诞，但是他们的本事确实高出中国人一筹。这种本事，不仅体现在做生意上，而且，在制造业、建筑业、航海业甚至于军事方面。小时候章承德就听说，他出生的晨光，西洋人——宁波人称之为红毛人——开着大兵船来打镇海关。仅仅二三千个洋人，硬是打败了几万清兵。结果，朝廷被迫赔了几百万两白银，还把宁波辟为洋人的通商口岸。

承德与彼得罗先生结识是在一个夏天闷热的午后。那天中午，承德把舢板停泊在外滩小码头附近一个阴凉地方，掏出《英语注本》专心致志学习英语。这本《英语注本》是他学生意的师傅送他的，里面用宁波话注释了一些日常英语读音。靠这本书学习，章承德可以与洋人进行简单的对话，尽管他的英语说得很不准确，被上海人称作洋泾浜英语，但是只要外国人能够听懂，他的目的就达到了。

“哈罗，你，过来！”突然，章承德听到有人喊他。一抬头，看见有一位外国老头满头大汗站在小码头上向他招手。

“哈罗，好嘟嘟！”章承德微笑着操着蹩脚的洋泾浜英语打招呼，请外国人上他的舢板。

“你，把我送到那边，要快的！我，给你一块‘麦内’(钱)！”外国人指着停泊在江面上的轮船焦急道。章承德听懂了，他脸上一阵惊喜：这个外国老头居然愿出一块大洋船资。摇了几个月舢板，章承德还没有遇上出手这样大方阔绰的客人。“欧开(OK)”章承德高兴地应了一声，上前扶外国老头上舢板。

外国老头脸色红红的，满是胡须的脸上那个酒糟鼻子特别扎眼，就像所有中国人看洋人，他猜不出酒糟鼻子的年龄有多大。酒糟鼻子就是章承德遇上的贵人彼得罗先生。彼得罗先生看上去很谦和，上了舢板以后，连说了多句“烧紧(对不起)，三颗油(谢谢)”，似乎大热天正午让章承德摇船送他，很过意不去。发现章承德懂他说的话，彼得罗先生惊奇问：“你，会英语？”“唔唔(不不)。”章承德赶紧摇头否认，他那几句洋泾浜外国话，咋算懂英语。

彼得罗先生看到那本《英语注本》，他翻看了几页，对章承德跷起大拇指道：“你，好

的，有记(志)气啊！”

说话间，舢板就到了轮船舷梯旁，彼得罗先生赶紧上船，他对章承德说：“你，等着，我去就来，很快的，一块麦内，等一下给你。”“欧开！”章承德高兴答应了一声，把舢板缆绳系在舷梯上。他觉得今天运气好极了。入夏以后，他几个同乡舢板夫中午都不愿意等客，回家困午觉去了。这难怪他们，宁波人有句老话，好汉不赚六月钿，何况大热天中午，通常没有一个客人，还不如回家困觉。

章承德中午不回去困午觉，赚钱倒在其次，主要是中午没有客人，他正好可以对照《英语注本》学习英语。一连十天，他中午一个生意都没有接到。不过他并不生气，因为他借这段时间学习，又掌握了很多外国话。他咋也想不到，今天运气那么好，一个中午居然可以赚到一块大洋。

彼得罗先生很快下来了，踏上舢板，他马上掏出一块大洋给章承德：“快，快快地回去！”他的手指向来时的小码头。章承德连忙解开缆绳，把舢板摇得飞快。这时，江面上突然起风了。“糟糕，要下雷雨了。”章承德一急，把舢板摇得更快了。但还是晚了，快到码头边上，豆大的雨点已经落下来了。舢板还没完全靠上码头，彼得罗先生抱头就往岸上冲，哪料到小舢板哗啦摇晃了一下，彼得罗先生一个跟跘，人倒是没有掉落到江中，可是夹在腋下的皮包却掉进了江里——“哎，麻爻摆格(我的包)！麻爻摆格！”彼得罗先生着急地大叫。

承德一看不好，急忙用船桨去捞皮包，可是这辰光江水流急，皮包很快漂远了，且渐渐沉了下去。“天哪！快捞我的皮包！快快！”彼得罗先生急得捶胸顿足，全然顾不上暴雨倾盆大声喊。承德看彼得罗先生急得要发疯了，他也没想，一个猛子扎到江中，朝皮包沉下去的地方游去。承德在暴雨中的江里扎上扎下，足足折腾了半个时辰，但是江流水急，又加上暴雨倾盆，哪里有皮包的影子。彼得罗先生看承德已经筋疲力尽，他怕承德出事，就叫承德上来，不要捞了。承德上岸，看到彼得罗先生被淋得像落汤鸡，于是对彼得罗先生说：您先回去换衣服吧，待会我再捞一会儿，捞上来会给您保管的，放心！

宁波商人

徐志明

